



大会

Distr.
GENERAL

A/50/663
24 October 199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12(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古巴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递交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卡尔-约翰·格罗特先生按照人权委员会1995年3月7日第1995/66号决议¹第12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5年7月25日第1995/277号决定编写的关于古巴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
第1995/66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5/277号决定
编写的关于古巴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导言	1 - 6	3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7 - 23	4
A. 不受基于政治理由的歧视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和 结社自由权	7 - 20	4
1. 一般意见	7 - 13	4
2.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报告的主要发生在1994年 和1995年的个人案例情况	14 - 20	6
B. 新闻自由	21 - 22	15
C. 司法行政	23 - 27	16
D. 因警方胡作非为造成死亡的事件	28 - 31	18
E. 离开和返回国家的权利	32 - 36	19
三、监狱状况	37 - 42	21
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受情况	43 - 50	22
五、结论和建议	51 - 60	24

一、导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于1995年3月7日通过题为“古巴的人权情况”的第1995/66号决议。在该决议中,人权委员会决定把1992年3月3日第1992/61号决议规定的特别报告员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卡尔-约翰·格罗特先生为根据1992年3月3日第1992/261号决议任命的特别报告员。

2. 人权委员会第1995/66号决议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5年7月25日第1995/277号决定核可,该决议请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一份临时报告。本报告是根据该项要求提出。

3. 委员会在同一决议中对特别报告员上次报告内所载的资料表示关切。该报告说,古巴继续发生侵犯基本人权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自由的事情,并遗憾地指出古巴政府继续拒绝与特别报告员合作,不准他访问古巴履行任务。该决议并再次呼吁古巴政府准许特别报告员有充分执行其任务的机会,特别是准他访问古巴;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内所述的许多违反事件没有获得答复表示遗憾;并呼吁古巴政府以公认的标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4. 委员会并请特别报告员同古巴政府和公民保持直接联系。为此,特别报告员再次请古巴政府给予合作,其中之一是给予他访问古巴的机会,以便他能够执行其任务。这项请求仍然未获答复。

5. 在同古巴公民保持联系方面,特别报告员尽量广泛地扩大这种联系,并表示他愿意会见任何想见他的个人或团体。

6. 为此,并考虑到从外面收集到的关于古巴境内人权情况的资料来源大部分在美利坚合众国,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8月28日至9月1日前往纽约和华盛顿,在那里会见了各行业的古巴实况问题专家,包括学术界的专家;最近离开该国并曾被侵犯人权的人民;下列组织和团体的代表:古巴人权组织协调机构、古巴人权委员会、支持古巴人权运动委员会、民主工人联合会、自由屋、古巴工会、人权观察组织、古巴

反对封锁委员会、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美洲协会、古巴流亡海外共济会、古巴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小队、古巴民主联盟、十一月三十日运动、人权中心和古巴流亡自治市政组织。特别报告员除收到上述来源所提供的书面资料外,还从古巴人权运动情报局、古巴政治犯世界联合会和大赦国际收到书面资料。此外,还收到从古巴国内外寄给特别报告员的许许多多个人信件。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A. 不受基于政治理由的歧视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

1. 一般意见

7. 古巴人权情况的特点仍然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组织工会权和加入工会权以及罢工权受到严厉限制,公民的个人活动被官方严厉控制,其中包括公民必须得到内政部的许可才能自由到海外旅行,保安部队为了维持这种控制而大力镇压,刑事司法行政制度大部分为现有的政权服务。所有这些因素,加上近年来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部因素,使约10%的人口(古巴人口约为1 100万)居住在海外,而大量的人,不论职业为何,认为只有移民国外才有较好的前途,并且愿意以任何方式离开古巴。

8. 在特别报告员获任命担任该职位以来曾有机会访谈的人之中,许多人强调古巴目前的人权情况的特点不是生命权受到系统的侵犯——这无疑是国际文书中所体现的最基本的人权,但这类确实发生的侵犯事件明显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此外,其他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护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点,并且深深植根于《宪法》所奉的政治情况(根据《宪法》,人民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只能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拥有这种权利),因此,不应以孤立的观点来看待诸如基于政治理由加以拘留或处罚非法离开国家的人的案件,而只能将视之为缺乏多元化所产生的特征。个人如果向“独立”机构提出指控也要冒着危险,因为任何被认为是独立于任何意识

形态官方机关之外的机构均属非法,因此很容易受到打击并且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9. 近年来,尽管困难重重政治性团体和维护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团体陆续成立。这一过程无疑因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有所加速,但在此之前,这个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1976年已成立了古巴人权委员会,但目前这个委员会仍未合法化。

10. 政府继续竭力缩小这些团体的重要性,称它们为“小型团体”和“反革命分子”。不过,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团体十分重要。首先因为最低限度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团体是为了满足普通公民寻求解决他们面对的所有问题的另外途径的需求而产生的。第二,它们的存在酝酿着民间社会和多元化的诞生,因为在目前的社会中只有个人和也控制着基层组织的国家机构,而两者之间不容许存有任何机构。虽然这些政治团体代表着广泛各种的意识形态,但它们都秉持维护个人权利的信念,强调个人在国家的保护和法治之下应在社会中占有一个位置。它们同时都采取一个以和平方式进行抗争的战略。

11. 上述事实并不表示所有批评均被禁止。古巴有一些政府渠道让公民(甚至鼓励公民)就公共服务缺乏或其他方面的缺点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但这些不满不得攻击制度的根基,也不准由独立、有组织的团体提出。

12. 1995年,一名神父以个人身份作证,以口头方式向特别报告员描述了他认为许多公民所认为的古巴情况:

“我认识一些人被拘禁了40天,体重减轻了40磅,即每天减轻约半公斤。整个社会处于恐怖气氛之中,因为人们看到,一个人被监禁了40天之后,出狱时就变成了一具活尸体,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使他的心理完全迷失方位。还有更多其他方法最终更能毁灭个人和社会,我指的是古巴的告发制度,例如控制和监视的方法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这一方法甚至用于儿童和老年人身上。由于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告发者,所以每个人都不信任任何人。这不但造成恐怖气氛,而且由于人人不敢说心里话,社会上因而充满着谎言。显而易见,我们活在一个虚假

面孔的国家里,对社会来说,这是绝对自我毁灭。人人都不知道该信什么,因为人人都不说心里话,人人都讲一套做一套,因此人人都处于完全迷惑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使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在社会之中,为什么他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虚伪的世界造成了人们的痛苦和悲哀,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堕落,因而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他们是希望、疲乏和受压迫的人……

“当局不断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它们以毁灭人类尊严的手段来攫取权力和运用权力……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能力的人必须创造机会开辟进行对话、尊重他人、最后建立参与和听取别人意见的渠道,这些渠道就是举行投票、与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敢于在这个一言堂的社会里表示不同意见的团体进行对话…
…

“古巴以前从来不是一个人民要移居国外的国家,而是一个移民要进来的国家,但是,现在古巴人的唯一希望是能够离开本国。有时一些具有较大良知和抱负、充满宗教或爱国理想的人别无选择,只好离国他去。我们可以说,古巴的悲剧是那些当权者有足够力量维持其权力,但没有足够力量以创造性方式改造国家使它迈向将来。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或道德权威打破僵局,但有足够的残暴力量继续统治国家”

13.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古巴社会内进行的改革,主要是经济部门内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较有益的框架,使刚开始的非组织运动能够改革古巴的民间社会,并呼吁社会和政治当局之间的关系改为民主的统治。

2.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报告的主要发生在1994年 和1995年的个人案例情况

14. 1994年11月,特别报告员从非政府来源收到一份名单,其中列有1195名因政治罪而服刑的名单。² 1995年,其中一些人在服刑期满前被释放,以下是其中的一部

分人员:Sebastian Arcos Bergnes、Rodolfo Gonzalez Gonzalez、Marta Maria Vega Cabrera、Caridad Lima Garcia、Arnaldo Pascual AcevedoBlanco、Barbaro Licourt Medina、Juan Luis Fuentes Valdes、Amador Blanco Hernandez、Jorge Luis Carmona、Luis Felipe Lorens Nodal、Joel Mesa Morales、Carlos Orue Caballero、Juan Jose Perez Maso、Julio Cesar Perez Maso、Rolando Quinones Medina、Indamiro Restano、Guillermo Rodriguez Almora、Luis Rodriguez Leon、Roberto Rodriguez Morejon和Alquimedes Ruiz Columbie。

15. 不过,因政治罪而服刑的人员名单似乎并没有就此结束:1995年8月又收到了上述名单的最新版本,其中大约包括1 500人,至少115人显然是在1994年和1995年被捕。在大多数案件中,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仍旧是敌对宣传、“危险行为”、危害国家治安、蔑视、反叛等等,这些通常是指谴责或批评该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和平行动。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对一般犯罪提出指控的背后还隐藏着真正的动机。

16. 下面是特别报告员在本年度得知的一些案例情况:

(a) Cristina Alfonso Valdes是Partido Democratico 30 de Noviembre的一名成员,1995年1月24日在哈瓦那遭一名警察枪击,当时他挺身而出为正遭到毒打的兄弟辩护。事发两个月之后,他被指控犯有蔑视罪,检察厅要求判处三年徒刑。Nurgia Torres Leon目睹了事件,为Cristina Alfonso辩解,但也遭到犯蔑视罪的指控,检察厅同样要求判处他三年徒刑。

(b) 哈瓦那市省级法院在涉及敌对宣传和其他危害国家治安罪的第36/94号案件中判处以下人士一年至三年徒刑(有些案例改为限制自由):Jorge Heriberto Alfonso Aguilar、Ivan Curra de la Torre、Ileana Curra Luzon、³ Felipe Lazaro Carrazana Diaz、Pedro Pablo Denis Blanco、Carlos Denis Denis、Rodolfo Valdes Perez、Regla Tapanes Tapanes、Ariel Lavandera Lopez、Maria Elena Bayo Gonzalez 和 Marcos Gonzalez Hernandez。判决书表示,被告

人“反对古巴革命进程及其基本原则,企图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破坏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企图在许多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传单是他们在家中印制的,含有“打倒菲德尔”和“全民投票”的字样。

(c) Armando Alonso是古巴人权委员会一名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居民。1993年4月5日他携带假造证件进入古巴,随后被捕被拘留在Villa Marista国家治安警察局。据报道,到1994年8月4日,他在巨大压力下发表声明反对其小组的其他成员。当天,他在审判中被判12年徒刑,罪名是进行敌对宣传和其行为危害国家治安。1994年底,他从Combinado del Este监狱转往Camaguey地区的Kilo Ocho监狱。据报道他被单独监禁。

(d) 1993年12日,Cienfuegos地区的San Fernando de Camarones浸礼教会的俗人牧师Jorge Luis Brito Rodriguez和Miguel Angel Leon Garcia被捕并判处六年监禁,罪名是进行敌对宣传和反叛,书写反政府传单并组织“反革命集团”在教会内聚会。他们正在Ariza监狱内服刑,而且前者患有严重疾病。在同一案件中,Alexis Carballosa Falcon、Juan Silvio Duenas Marrero、Salvador Aguiar和Roberto Diaz也被判刑。

(e) 1994年3月14日,Garnma省Jiguani市的Minajarle地区居民Leonardo Cabrera Arias、Lino Jose Molina Basulto、Ramiro Angel Rodriguez Leyva和Jorge Oscar Rodriguez Leyva被判六至八年徒刑,罪名是进行反叛和危害国家治安,“聚会评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收听外国广播,书写宣传品,以及寻找聚会场所”。被告人表示,他们每周聚会,讲读圣经。他们在Granma省的La Manga监狱服刑。

(f) 1994年5月,古巴全国人权理事会主席Francisco Chaviano Gonzalez被捕,⁴并关押在Villa Marista警察局。据在该中心被关押的人士提供的消息,在该警察局被关押的人士经常连续19个小时得不到食物,并被迫在单独拘禁室面朝灯光,躺在铁板上睡觉。他们还常常得不到饮水,而且三四天内不允许洗漱。估计这就是

Francisco Chaviano获得的待遇。在同一案件中至少还有3人接受审判,Abel del Valle Diaz、Pedro Miguel Labrador和Juan Carlos Gonzalez Vazquez,罪名是“泄露国家治安机密”以及“假造文件”。审判是于1995年4月15日在一军事法庭内进行,尽管几乎所有被告都是平民。Abel del Valle Diaz的律师随后在迈阿密的报纸⁵上撰文说,审判是秘密进行的,换句话说是在没有律师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只是在开庭3天之前才允许他翻阅记录并与被告面谈。而且还不允许律师查阅两份被列为“秘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怎样打击餐馆、旅馆和服务业以及燃料业的经济犯罪),据称发现被告持有这些文件,因此构成一项主要指控罪行。不允许被告的几名证人出庭,审判是在秘密中进行,被告的家人和朋友在法庭进口处遭到“迅速反应部队”成员的威胁。人权小组的一名成员在去法庭的路上被拘留,几小时后被释放。Francisco Chaviano被判处十五年监禁,Abel del Valle被判三年。

(g) 1993年9月21日,公民民主党的一名成员Efrain Garcia Hernandez被捕,并于9月27日被判四年徒刑,罪名是“行为危险”。据称在审判中造成其被判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常常酗酒过量,并发酒疯。不过,他的邻居否认这一指控。

(h) 1994年6月12日,Partido Democratico 30 de Noviembre主席Rafael Ibarra Roque在San Miguel del Padron的家遭到国家治安警察的袭击,其家人受到威胁。6月17日,他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与他同属一个团体的内弟Yadel Lugo Gutierrez,他们同被押往Villa Marista国家治安局。Yadel Lugo随后被释放。国家治安警察分别于7月和8月分别搜查了Rafael Ibarra Roque的家,并没收了该家庭合法拥有的家产,如一辆汽车、一个煤气灶、一台电视和几只家庭动物,他们当时持有搜查证,可以没收据称非法获得的物品。1995年2月,哈瓦那市省级法院开庭审判,指控被告进行颠覆和拥有武器,因此判刑20年。目前他正在哈瓦那的Combinado del Este监狱服刑。根据收到的消息表明,被告的妻子Maritza Lugo和其他家人仍然遭到骚扰。Yadel Lugo Gutierrez曾多次遭到威胁,而且于1995年2月被其工作研究中心解雇。

(i) 1994年6月26日, Jorge Luis Ortega Palacio被捕,原因是展示一张上面写有“打倒菲德尔”的床单。他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一年零三个月的徒刑。被捕时他遭到毒打。同年10月,他从Taco Taco监狱被转往设在Pinar del Rio地区的Cinco Y Medio监狱。据报道,目前他的健康情况很糟,但却没有得到医护。

(j) 1994年8月5日, Vladimir Petit Ramirez在哈瓦那出现反政府示威的地区因持有录像机被捕。他因参加动乱而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

(k) Noel Reyes Martinez, 25岁,是11月30日民主党的党员,他于1995年6月3日因在公共场所高喊反政府口号而被逮捕。他被带往哈瓦那10 de Octubre 区 Reparto Luyano 的 Lugo 和 Acierto 之间的 Calzada de Luyano 警察局,据称他被严重打伤。在收到这份报告时,他已被有条件释放,他被指控的罪名是藐视法庭,为此检察官要求判他坐牢两年。

(l) Orson Vila Santoyo, 一位福音派教会牧师(上帝会中央区督察员),他于1995年5月25日在 Camaguey 省被逮捕,原因是他拒绝关闭他在住处开设的“礼拜堂”。⁶ 据说在1995年5月和6月, Camaguey 省现有的大约100个礼拜堂有大约80个被关闭。他被控的罪名是“非法聚会”和“违抗命令”,他在同一天受到简易程序审判,并被判坐牢18个月。他在 Camaguey 省 Ceramica Roja 监狱服刑。Camaguey 省福音派教会的另外两位牧师 Balbino Basulto 和 Benjamin de Quesada 也被逮捕,但数小时后获释。

17.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因犯下出于政治动机的罪行而服刑的那些人所忍受的恶劣条件,特别是他们的健康和缺乏医疗照顾。以下是该报告提出的案例:

(a) Gustavo Rodriguez Sosa, 他在 Granma 的 La Manga 监狱服刑,他的罪行是反叛和为敌宣传。他患有慢性关节炎。

(b) Ruben Hoyos Ruiz, 他从1990年以来就被关在 manacas 监狱,他因为传播敌人的宣传品而被判坐牢5年。最近他在监狱因藐视权威而受到审判,他被判多坐两年牢狱。他有糖尿病,据说他的眼睛需要动外科手术;

(c) Tiburcio Felix Ramirez, 60岁, 他因为犯下为敌宣传的罪行而被判坐牢8年, 目前正在 Granma 的 La Manga 省立监狱服刑。他有眼科疾病, 是在监狱开始患病的, 他没有受到医疗照顾;

(d) Cesar Codina, 73岁, 他由于散播敌人宣传品而被判坐牢5年, 目前正在 Granma 的 La Manga 监狱服刑。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并有精神病, 因此很难自理生活;

(e) Armando Espinosa, 74岁, 他因为反叛罪而在 La Manga 服刑。他患有肺癌;

(f) Luis Rodriguez Leon, 52岁, 他由于犯了为敌人宣传和非法集会的罪行而被判刑7年, 他正在 Pinar del Rio 的最大安全监狱 Kilo 8 服刑。根据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1月收到的资料, 他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和慢性胃炎;

(g) Omar del Pozo Marrero, 有一位外国医生于1995年5月在哈瓦那 Quivican 监狱为他看病, 诊断结果是, 除别的以外, 他患有高血压、营养不良和严重的肠胃病。他被转往哈瓦那 Carlos Finlay 军医院, 他在该医院住了5个星期但未得到必要的医疗照顾。在结束住院时, 他被送往 Guanajay 监狱, 据报他被单独监禁, 他的健康状况继续引起人们关注;

18. 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关于因行使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而被骚扰、房屋被搜查、临时逮捕、失去职业或受到其他种类的报复行为或基于政治理由而受歧视的案例。另一方面, 由有关当局动员个人采取的“否定行为”的数目据报在这一年已经减少。以下是最近报导的案例:

(a) 居住在 Liga Civica Martiana 的 Ramon Varela Sanchez、Carlos Alberto Guzman Gonzalez 和 Miguel Angel Oliva 于1995年7月在哈瓦那被逮捕。

(b) 来自 Artemisa 镇的 Lorenzo Perez Nunez、Luis Alberto Lazo Borrego、Javie Marquez Borrego 和 Maritza Nunez 以及来自 El Mariel 镇

的 Juan Francisco Monzon Oviedo 于1995年8月10日被逮捕,他们都是 Martiano 民主党的党员,国家安全局人员后来将他们转往 Villa Marista 拘禁中心,他们还搜查了这些人的住房;

(c) Joaquin Cabezas de Leon、Librado Linares 和 Cecilio Monteagudo Sanchez 是 Villa Clara 城 Camajuani 地区的集思会会员,他们在1995年1月被国家安全部传唤,并威胁他们如果继续在集思会中展开活动就要对他们提出检控;

(d) Mercedes Parada Antunez 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内被临时拘禁,他们威胁要追加坐牢的时间(他在1993年至1994年坐牢一年之久);⁷

(e) Luis Alberto Muro Gutierrez 是一名作家,并且是不同反对团体的成员,例如自由艺术协会,据指出他自从1980年代以来他就受到不同形式的骚扰和歧视,包括被逐出文学讨论会,没有机会在艺术和人类学方面进修,不可能获得就业机会或出版他的作品等等。1994年4月3日他在哈瓦那市国家旅馆陪伴两名外国朋友时被4名国家安全人员逮捕,他被殴打以至头颅破裂。一年后他仍然在接受治疗;

(f) Felix Mario Fleitas Posada 是拥护宪政民主会的成员,他于1994年12月11日被传唤到 L y Malecon 警察局,官方警告他不要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他们威胁要报复他的家属,不让他们同人权团体保持接触;

(g) Juan Guarino Martinez Guillen,是所谓的古巴民主工人联盟的主席,他于1995年7月13日在哈瓦那市中心被逮捕,他被审问并受到威胁。同一天同一个联盟的成员 Maria Elena Argote Gonzalez 也被国家安全人员传唤,他们威胁着要审判他;

(h) Jose Antonio Fornaris Ramos ,是民族进步自由团结阵线的成员,他于1994年6月16日在哈瓦那被逮捕,他被拘禁在位于 Aldabo 街100号的技术调查部办公室达19天之久,在那里他被审问并受到威胁,目的在恐吓他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

(i) 在1994年最后一个半月内,安全组织传唤和威胁了下列的基督徒自由运动的

成员,其中大部分住在哈瓦那:Segundo Lima、Miguel Salude、Encarnacion Echenique (哈瓦那 Guines 镇)、Antonio Llaca、Elio Ridrugyez、Pedro Ferreiro、Omar Victores、Ramon Antunez、Antonio Hernandez、Rafael Leon (东哈瓦那)、Rodriguez 牧师(San Miguel 镇)、Andres Rodriguez(Holguin)、Regis Iglesias、Marve Mora(Santiago de Cuba)、Pedro Valdes(Aguada de Pasajeros、Cienfuegos)、Antonio Sanchez、Armando Barreras、Efren Martinez(San Luis、Pinar del Rio)、Ernesto Mayea、Alejandro Paya、Oswaldo Paya;

(j) 当局在7月初逮捕了很大一批政治和人权团体的成员,当时是“13 de Marzo”拖船的周年。⁸还有报导指出,当时在哈瓦那展开了广泛的警察行动,以阻止反对派集团开展任何纪念活动。当局取消了原定在耶稣圣心教堂举行的弥撒,该教堂被关闭;

(k) Jose M. Gil、Alfredo Santana、Roberto Gonzalez、Eduardo Garcia Nieto、Rafael Vigoa 和 Miguel Padilla 都是哈瓦那 Jose Antonio Echeverria 工学院的教师,他们因在1994年9月28日致函教区长,表示他们不同意政府对待1994年8月5日参加示威的人的方式并主张古巴应朝向民主发展而受到惩罚。虽然他们没有被正式驱逐出境,但是受到的惩罚包括不允许他们在该国任何教育机构教书;

(l) 比那尔德里奥省Piloto的居民Jesus Marante Pozos在拒绝继续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之后,被 Abel Santamaria教学医院开除,其妻 Yanelis Garcia Gonzalez医生被Primero de Enero综合性医院开除。

(m) 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市贸易学校的一名西班牙语教师Rubiseida Rojas Gonzalez被革职,并于1994年11月3日被古巴教育部门开除。在1994年3月,他因拥有几份迈阿密报纸《新先驱报》和其他外国出版物而被同一个学校开除主任的职位。最后决定将他开除的根据是,他做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古巴社会原则的事情,因为他不属于保卫革命委员会,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也不将一天的工资捐

给领土民兵部队。

(n) Enrique Jose de la Coteria Doce是圣何塞-德拉斯拉哈斯的Jose Antonio Echeverria 技术进修学院的一名教师,他于1995年6月30日被革职,因为他表示不愿意继续参加一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如行政部门所命令的义务劳动和政治及工会的活动,而且,他也表示不愿意向工会和领土民兵部队支付强制性的收费。

19. 特别报告员仍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国际劳工组织实施公约和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在《关于在雇用和职业方面的歧视问题第111号公约》⁹中已批评了开除教师的做法,但是,这种情况仍在发生。委员会在最近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委员会忆及,拉丁美洲工人中央联合会(工人中央联合会)在1992年断言,有14名名大学教师因发表政治意见而被开除,这些教师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一份八点的《原则宣言》中签名,并送交给各自的顶头上司。政府的答复是对该事项的调查表明,所涉教师已不再具有教学所需的基本素质,而且是采用了1980年第34号《法令》,该《法令》规定,高等院校教师的开除问题可以由大学校长决定,而且可以提出上诉。有九名被开除的教师向教育部¹⁰上诉,但他们的上诉没有被接受。

“委员会再度敦促该国政府解释‘教学所需基本素质’的含义。委员会注意到,该国政府已表明,已经向所涉教师提供工作机会,但是被他们拒绝,尽管如此,委员会要求该国政府表明,除了上述向教育部长提出上诉的程序之外,这些教师是否还有其他补救的办法,以便能够防止遭受任何以该《公约》中的理由,尤其是政治意见为理由所采取的歧视性作法。

(……)

“关于1989年12月20日涉及恢复受第34/80号《法令》影响的教师原职的第2号决议(……),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教师只能在完成五年惩罚性的工作之后才能恢复原职,而在这五年中,他们被排除在教育部门之外。委员会注意到,根

据政府的说法,考虑到恢复原职的原因,这段时间可以减少到五年以下。

“委员会一定记得,这项立法是用非常笼统的措辞编写,因此,可能会造成对任何在教学中接触年青人的教师采取歧视性的作法,这些作法可以通过惩罚加以实施,其中包括让他们离职很长时间。委员会认为,这些规定不符合该《公约》的原则,并指出,只有当这些规定用来针对某些涉及特殊责任工作的资格要求时,他们才符合该《公约》……委员会要求该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根据该《公约》第3(c)条的要求,在不久的将来撤销这些立法规定”。¹⁰

20. 另一项令人不安的情况是,获释的被监禁者因政治原因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被贴上‘不受信任者’的标签,使他们完全无法参与专业或技术性的工作,无法获得行政管理职位或负有重任的职位,也无法被外国公司聘用,即使他们的资历和技术可能使他们成为这项工作的最理想候选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被降到不重要的职位。此外,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关于具有政治动机的歧视作法的报告,这些报告表明,在经济最繁荣部门中应聘时,包括具有外国投资的部门,工人们受到这种歧视待遇。

B. 新闻自由

21.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记者遭受报复情况的资料,这些报复行为包括被开除和因职业缘故发表对现制度批评意见而被起诉等。例如,为《先锋报》和《足迹》等报纸工作的Alexis Castaneda Perez de Alejo的情况正是如此,1994年5月15日,他因发表被说成是“敌方宣传”的言论,而被判处五年监禁。

22. 许多因政治原因被开除的记者已成立各种未经许可的新闻机构,以便向外国通讯媒体传送资料。然而,他们的住房常常被搜查,他们的设备(传真机、照相机、录音机等)被没收,而且还对他们采取其它类型的恫吓措施,这些情况详见如下:

(a) 独立新闻社总裁Nestor Baguer于1995年3月2日在哈瓦那遭到一名身份不明者的进攻,手腕被打破,而且还有其它几处受伤。7月11日,国家安全人员搜查了他

的住房,并没收了一台由无国界记者组织送给他的传真机,他们还切断了其电话服务。几天后,Baguer先生向该市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设备,但是该法院秘书以这项控诉没有法律根据为由,拒绝加以接受。

(b) Roxana Valdivia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特约记者,而且是独立新闻机构在卡马圭的成员,她于1995年5月22日被捕,并被盘问长达10个小时。之后,他仍收到多次电话威胁。Orestes Fandevila、Luis Lopez Prendes和Lazaro Lazo也是独立新闻社的成员,他们于1995年7月8日被捕,并被盘问几个小时。

(c) Rafael Solano于1994年被Rebelde电台和Taino电台开除,目前,他是哈瓦那新闻社的成员,他于1995年7月12日在圣米格尔-德尔帕德龙被捕。在他被拘留的15个小时期间,被指控参与宣传活动,并威胁他如果继续向美国Marti电台和《迈阿密先驱报》及《美洲日报》传送报导,则会遭到起诉。

(d) Jose Rivero Garcia是哈瓦那记者协会的成员,他的住房于1995年7月13日遭到国家安全人员的搜查,这些人没收了一台摄像机、一台传真机和一台打字机。

C. 司法行政

23. 特别报告员从古巴境内的律师那里得到的资料表明,他们关切司法行政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司法制度没有独立于政治当局,这一点在审判政治犯时特别明显。还有报道说,从事法律职业也同样缺乏独立性。1984年6月8日的《第81号法令》及其规则规定,成为全国联合律师事务所组织的会员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为了加入这个组织就必须具有“符合我们社会原则的道德品质”(该《法令》第16(a)条),这种做法在实际上就阻止了那些不同意官方思想意识和政策的人加入该组织。尽管该《法令》第5条宣称该全国组织是一个“自治实体”,但仍由司法部检查、监督和监测其活动及其会员的活动,发布规则和其他规定,并履行其他附加职责(见《法令》的第1条特别规定和条例中的第12条)。

24. 在理论上,全国组织由其会员律师们选举的大会进行民主管理。然而,据收

到的资料,选举主席团的公开(并不是秘密)制度(条例第13条)意味着实际上,参加选举的人均选举共产党或其青年分部的书记或党员(共占有所有代表的85%以上),以及选举其他当局认可的候选人。通过恐吓阻止人们发表与当局观点不同的意见。

25. 关于结社权利,古巴律师全国联盟对古巴律师的结社具有独断的权力。据收到的资料,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其活动和安排中发挥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共产党内任职。自1990年以来,一些律师一直采取措施以建立一个名为“古巴联合工会”的独立组织。他们在1991年2月向司法部提交了一份组织合法化的申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26. 另据报道说,联合工会的成员常常成为各种压力措施的受害者,从“友好的意见”到从行政上禁止他们为人权活动家及政治反对派成员辩护,种种压力不一而足。全国联合律师事务所组织领导人方面对有人签署包含有关于国家或专业问题不同意见的请愿书抱有公开的敌对态度,从而造成将签字人传唤到会,在会上对他们施加压力,最终有可能禁止他们从事律师职业。采取的措施还有禁止律师们在私人家庭集会;例如,在1995年4月22日,三个身分不明的人士闯入Jorge Bacallao律师的家,当时他正在与其他几个律师开会。被警察当局和检察院传讯,遭到任意拘禁或监禁均屡见不鲜。例如Freddy Reyes Lafitta的案子,他因在1993年书写反对政治当局的标语而被判犯了进行敌对宣传的罪,被判四年监禁。

27. 1995年年初,Marianao集体法律事务处的Leonel Morejon Almagro律师和哈瓦那撤诉办公室的Rene Gomez Manzasno分别被从其各自办公室驱逐出去。此外,Castor de Moya Viera律师、Juan Escandel Ramirez律师和Jose Angel Izquierdo Gonzalez律师均受到监视和骚扰。所有这些律师都采取了批评古巴司法当局运作的立场,并为控有政治罪名的人士辩护。Sergio Hernandez Ramos是审判Francisco Chaviano¹¹一案的辩护律师之一,据报道,在1995年4月15日,当他在听证会后离开时,他被一辆国家安全局的汽车跟踪,并在到达Santa Fe大街时,遭到不明人士的袭击。

D. 因警方胡作非为造成死亡的事件

28.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申诉还包括一些由于政府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造成死亡或受伤人士的案例。最近几年最严重的一例案件肯定是1994年7月13日在佛罗里达海峡水域造成“3月13号”拖船的沉没,特别报告员在其以前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尽管政府认为当局对该项事件没有责任,但特别报告员从一些幸存者那里收到的证词表明哈瓦那港的政府船只试图通过高压水龙头阻止“3月13号”船,然后又故意撞该船,造成该船下沉。非政府消息来源向特别报告员通报说,死亡人数不是政府所说的32名,而是至少37名,一年来,罹难者家属一直在要求进行调查。然而,截至到1995年9月,该案子除了警方进行非常有限的调查,并向哈瓦那检察院备案外,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进展。在回答家属和律师的询问时,检察院在1995年7月中旬答复说,该检察院没有计划对这艘船只沉没进行法律诉讼。

2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Estanislao Gonzalez Quintana案情的报告,此人自1995年9月8日以来因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被拘禁在松树河附近的Consolacion del Sur警察局,后来死在那里。9月12日,一位亲属获悉该被拘留者因心脏病死亡,但据报,当在停尸房检查尸体时,可看见其伤痕累累,前额有一道深深的裂缝。

30.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有些人据说因从农场和农田里偷窃食物被警方当场捉住后打死的情报。Wilfredo Almira de Armas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他死于1994年11月12日,当时他进入松树河的Consolacion del Sur市的马里林农场打算偷鸡。1994年5月14日Reinerio Velasquez Avila被警卫开枪打死,当时他和其他一些人在Holguin镇附近的Via San Andres高速公路附近的国营“La Guanabana”香蕉园被人当场发现。

31. 特别报告员无法获得可靠情报以说明有关这类案件是否正按照一项普遍的

规定得到公正的调查,并使行凶者得到惩处。然而,他欢迎古巴政府就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给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答复。其中提到了这类案子中的一件,即Orelvs Martinez Limonta的案子。据这项答复,在1992年7月7日,经济部门的一个民事警卫发现此人从停靠在Santa Clara火车站的一列火车车厢内偷窃食糖,该警卫为抓住他而开枪,结果造成他的死亡。该警卫被Villa Clara省级法院判处十八年监禁。¹²

E. 离开和返回国家的权利

32. 古巴法律仍不承认所有公民有权自由离开国家或返回国家。在离开和返回国家这两种情况中,都需要得到许可证,而行政当局可以不根据法律的理由任意拒绝发放许可证,而且常常是以政治理由加以拒绝,例如下列的情况:

(a) Oswaldo 和 Alejandro Paya Sardinias是基督教解放运动的议员。移民部门已多次(最近一次是在1995年)通知他们,禁止他们离开古巴,甚至是暂时离开也不行,而且这项规定将无限期有效。

(b) 1995年春天,人权和民族和解委员会的 Elizardo Sanchez Santa Cruz被拒绝获准访问加拿大。

(c) Mercedes Pupo Robert 和 Ariel Garcia Pupo 持有进入加拿大的签证,却没有能得到出境的许可,Ariel Garcia Rivero 是前者的丈夫和后者的父亲,他居住在加拿大,在商船队工作,并于1993年获得加拿大的庇护。

(d) Hilda Molina Morejon 于1994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辞去精神病康复国际中心理事会理事的职位,其母亲 Hilda Morejon Serantes 没有获准暂时离开该国到阿根廷探访亲戚。

(e) Leonor Diaz Ramirez 没有获准离开古巴去探访其在美国居住的儿子,理由是他参加了反对古巴政府的宣传活动。

33. 允许暂时停留国外的最长时间为11个月。如果要离开该国,则采取没收的

措施。居住在国外的古巴公民每次想要进入该国,都必须获得许可证,获得这些许可证需要支付按古巴标准来说非常高的费用。此外,这些许可证通常只允许非常短暂的停留(两周或一个月),而且不管古巴公民已在哪国居住都需要获得这类许可证。

34. 任何试图非法离开古巴领土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

(a) Santiago Francisco Alvarez 是比那尔德里奥 Guama 电台负责录音、编辑和音响传输的技工,他在1994年下半年被宣布为“不受信任者”之后,遭到开除。他被控在 La Coloma 港购买了一艘船,打算离开该国。

(b) 属于民族联合阵线的 Mario Julio Viera Gonzalez 在1988年被开除农艺师的工作,并于1994年6月30日被捕。在前一天,他收到一份官方的传令,要求他到哈瓦那 Miramar 区位于第20街和3大道的国家安全局进行面谈。3天之后,他的家属获知,他已被转到谢戈德阿维拉省,去服1990年因“非法离开国家”而强加给他的两年徒刑,根据 Viera 先生的说法,在那一年所举行的审判中,并没有确定他实际上有离开该国的企图,因为事实上他没有这种企图。

(c) Carlos Alberto Ocana Romero 在公开发表反对该国政治制度的意见之后,失去了他在圣地亚哥总医院作为维修电工的工作。1994年3月13日,当他开始准备非法离开该国时,被国家安全当局逮捕。他被控犯有海盗罪和其他破坏国家安全行为,在1995年2月举行的审判中,被判处监禁一年。

35. 特别报告员的前几份报告已提到公民通过海上非法出境的现象,他们利用危险的运输手段,希望能到达美国海岸。因此,据估计,在1992年,约有2500人到达美国,1993年有3000人,而在1994年8月的危机中,大约有3万人离开古巴。¹³古巴与美国在1995年签署的移民协定是为了要停止这种现象。为此,除其他措施外,美国已保证将那些在海上拦截的所有古巴人归还给古巴,而非按照一直到1994年所采用的做法,为他们进入美国提供便利。古巴政府本身已保证不对这些人或对那些到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申请出境签证者采取报复行为。特别报告员衷心希望这项承诺将能兑现,同时,他感到关切的是,这项承诺与根据古巴立法非法离开该国仍是一项罪行的

事实之间显然存在矛盾。他也不想对非政府消息来源所做的报导表示关切,这些报道表明,尽管那些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居留许可而重新返国者通常没有得到迫害,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确遭受到其他方面的歧视,尤其是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

36. 此外,特别报告员从非政府团体获得一项载有试图非法离开古巴而在佛罗里达海峡据称消失者的部分名单。该名单载有103个名字,大部分是发生在1991年和1992年。他也收到一份载有真正民主一体化运动77个成员的名单,据称,在1994年8月发生的事件中,他们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命令离开该国,¹⁴其他组织的成员显然也遭受这类压力。

三、监狱状况

37. 非政府来源已通知特别报告员,他们在全国记录了294个监狱和劳改营;据估计,各种囚犯大约共有100 000至200 000人,占该国人口的比例极高。这是令人感到关切的问题,但要铭记着一项事实:特别报告员仍在收到关于监狱中危险的生活条件的报告,例如以下所述的。

38. 1995年初,Combinado del Este监狱发生细螺旋体病流行病,导致几个囚犯死亡,超过100名囚犯需要住院。

39. 特别报告员收到Camaguey省Kilo 7监狱某部分26个据说有肺结核病的囚犯的名单。此外,1995年二月,一场腹泻病使该监狱1 300名囚犯大多数都受到影响。据报马坦萨斯的Combinado del Sur监狱也暴发了肺结核病。该监狱过去一年死了6个人。此外,看来许多人有疥疮。

40. 一份关于Granma省La Manga省监狱状况的报告这样描述被以政治性控罪名拘押的人的状况:“我们与极端危险的罪犯关押在一起,这些人性格不健全或有精神病。许多时候,国家安全人员利用这些人的状况及他们的低道德观,用他们来践踏我们的尊严。国家安全人员用许多这样的人来做告密者,答应他们如果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就会给他们好处,并授权他们假如听到我们骂共和国总统的话就打我

们。此外,监狱当局搞了一个办法,让某些囚犯管制其余的囚犯,然后给他们一些特权。这些囚犯是凶暴的人,没有顾忌,极为危险。他们强加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任何囚犯稍为违反规则,他们就辱骂他,甚至毒打他。普通囚犯如向他们提供假消息,我们就要连番受到严峻的问话,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威胁我们之中的基督徒,要以所谓的“改变宗教信仰”罪名把他们作为普通囚犯来起诉;此外,我们不能举行宗教仪式,因为他们说我们有政治目的…食物做得很差,鱼常常是坏的,造成严重的消化问题。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关于其他监狱的报告也常常提到类似的情况。

41. 还有关于囚犯被工作人员毒打的消息。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份名单,所列的25个人据说曾在1995年在Combinado Sur监狱受到毒打。

42. 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对Alambrada de Manacas监狱一名前囚犯所提供的资信感到满意。这个人说该中心在1995年是关闭的。看来能够关闭是因为省检察官办公室接到了许多关于监狱的物资条件及囚犯的待遇的指控采取了行动。

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受情况

43. 古巴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是成为一个均等社会;为此目的,制订了诸如配给、价格津贴和限制工资水平等办法。与此同时,政府在人权领域的努力反映在高度就业率和扩展社会福利及受教育范围上。不过,如特别报告员前次报告¹⁵所述,为达到高度保护这些领域内全体人民所采用的经济手段似乎成效不大。事实上,数年来经济一直都是负增长,导致自1990年代初以来古巴普遍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受造成影响。

44. 危机的规模使就业率剧降。几乎80%的工业部门或是停止或者工作量极低,大约40%的劳动力若不是失业便是就业不足。为了补给损失的收入,国家继续给失业者60%的工资。但是,考虑到低水平的工资,这笔数额是不足以支付一般工人的基本需要的;因此,失业工人们往往被迫进行违法活动。近几年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的目的是制订使经济运作的市场经济机制,并包括促进外国投资的主要刺激因素。专家

们认为,这些措施似乎不可能降低失业率,反而会使其上升;这样必将使社会更不均等。

45. 通过配给证制度分配的基本粮食数量剧减;目前,这项制度足够应付每个月的头十天。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存在约略减轻了一些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价格,就每月大约180比索的国民平均工资而言,委实过高。例如:米的官方价格是每磅24仙,自由市场的价格则是每磅9比索。

46. 工资结构依职业而定,而非依工业部门或通过集体讨价还价而定,并且不管工人的经验、资格或产出,严格予以执行。制订工资比额表当时,经济仍采用高度补助方式,以达到较均等的社会。但是,目前的通货膨胀程度已使这个制度变成过时,使生活的平均标准大幅度降低,并迫使许多公民从事违法活动、找寻第二份工作、或是移居。工资结构的另一方面是付给工人本国货币,尽管经济继续美元化。事实上,许多基本消费品和服务都以美元付款,未获得以美元计算薪酬的工人便被剥夺了的享用的权利(汇率是一美元对40比索,平均工资则大约等于4.50美元)。政府从用外币运作的公司取得以硬币计算的利润,却继续以不可兑换货币支付最低限度工资。

47. 重大危机以及经济和就业改革大部分而言有损工人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工人愈来愈认为有必要设立自己的工会,以打破古巴中央工人联合会在这方面进行的垄断。如特别报告员在前几章提及的所有其他独立组织一样,这些工会尚未顺利取得合法地位,它们的活动也仍受到压制。¹⁶

48. 早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关于第87号公约(《关于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的执行情况就古巴中央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以及据称共产党在选举工会领导人时加以干预之事发表过意见,关于这项意见,委员会说:

“委员会适当地注意到会议委员会一名古巴工人成员对古巴中央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提出的意见,该工人成员说这种关系并未损及工会活

动的继续进行,因为古巴中央工人联合会是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核可其规章、规则和准则以及选举其领导人的,而共产党也未提出候选人。这名工人成员还说,古巴中央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由工人们民主地核可的,唯有他们才有资格决定改变与否。

“无论如何,委员会强调,一个由单一党和单一中央工会组织组成的系统在实施时可能导致对工会独立性有偏差的外来干预。

“委员会请政府在法律上和在设计时保证凡工人及雇主,无分轩轻,均有权在任何现有工会结构外建立他们自己愿意建立的独立组织(第87号公约第2条),这些组织均有权充分地选举它们自己的代表(公约第3条)”

49. 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到保健系统,这个部门还受到美国执行的禁运极直接、重大的损害。

50.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无数关于基本药品供应极端不足和叙述许多国立医院破烂情况的报告。多数时候,甚至省立医院也缺少止痛药、抗生素、麻醉剂等必需药品,以及缝合设备。或是为减少电力消耗或是因缺乏消毒溶液,衣物和用具,包括在手术示教室使用的那些用品,都未消毒,空气调节器则被关掉或设在最低速使用。还据报,在医药设备设施制造的产品主要打算用于出口或为外国人提供医疗的那些医院;外国人当然获提供一切所需。同时,在古巴的其他医院,病人则必须等待许久才能取得一付义肢。

五、结论和建议

51. 1955年期间,古巴政府在人权领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特别报告员表示满意。第一项措施是决定批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二项措施是在政府认真地听取了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要求之后,允许他们访问古巴,并部分同意了他们关于释放某些因政治罪行被监禁的人士,并没有附加要求这些人士离开该国的条件。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还决定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古巴,高级专员已在

1994年11月访问了古巴。关于1995年在古巴举行另一次有关“国家与移民”的会议的决定也是积极的,并吸取了前一年的经验,从而开辟了住在国内的古巴人与住在海外的古巴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尽管讨论的题目仍局限于非常具体的问题。

52. 古巴的经济局势也与最近几年的情况不同,即最近愿意以评论的方式评价以前的、并被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不可行的政策与解决办法。以前古巴经济政策所特有的抵触情绪似乎已让位于新的更为务实的阶段。然而,深刻的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尤其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失业和新的社会行为阶层。古巴不得不受到以下各种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例如自营企业、农产品和牲畜产品市场,以及在另一方面由相应的国家与外国企业家从事综合进出口经济的外国企业。与黑市相关而新产生的社会阶层也是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另一个因素。

53. 尽管美国国会为加强禁运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我们认为作为冷战遗留下来并显得苍白无力的美国对古巴政策是另一个使改革阻力越来越弱的领域。基于对古巴进行贸易和财政禁运的政策在国际以及在美国的广大重要领域也越来越失去支持。

54. 对于古巴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以一种有秩序与和平的方式,并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加以改革。这一点显然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古巴政府采取的内部决定是具有决定性的。然而,如果没有积极和有利的国际气候,这些措施将更加难以采取和实施。

55. 正如欧洲联盟已经与该区域其他国家进行的对话那样,该联盟与古巴政府目前进行的旨在就合作问题达成协议的对话应在经济领域和人权领域取得积极成果。为了确保在古巴社会似乎已不可抗拒的改革进程以和平及有效的方式进行,有必要建立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情报与行动渠道,但在古巴人民眼中,这些渠道也应是真正独立并具有合法代表性的。

56. 在人权领域,严重侵犯古巴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事件继续发生。由于尚未正式承认政治多元化和结社自由,情况只能是这样,因此,言论自由、新闻

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示威游行的自由仍然受到侵犯。凡是无视这种禁令的人,尽管这些禁令违反人权,均会遭受迫害、歧视甚至被监禁。根据古巴的《刑法》,进行敌对宣传、非法结社、对社会造成“危险”、非法入境或离境等等仍然被不公正地定为犯罪。

57. 对反对派人士和独立的人权活动家进行镇压的个别案件情形仍然没有变化,尽管,据收到的情报,由快速反应部队进行的“批判行动”的次数有所减少。如果在这方面察觉出什么进展的话,这就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讨论的气氛--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讨论已对古巴现存的制度的重要方面提出质疑。

58. 由于1995年期间继续出现违反人权的现象,使特别报告员不得不向古巴政府重申和前一年同样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可以大幅度改进人权情况的措施,这些措施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需要作出行政决定:

(a) 停止以与和平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有关的理由迫害和惩罚公民;

(b) 立即采取措施无条件释放所有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有关罪行及企图非法离境罪行而服刑的人士;

(c) 允许独立团体,尤其是那些努力开展在政治、工会、专业或人权领域活动的团体合法化,允许它们在符合法律的范围开展行动,但不得不适当干预当局的行为;

(d) 批准古巴尚未加入的主要人权文书,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第一项是关于个人通讯自由的,第二项是关于废除死刑的)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e) 从刑事犯罪种类中删除那些公民们因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自由而被判刑的罪行,例如敌对宣传、非法结社以及拥有非法印刷的材料;限制套用其他并未具体如此规定,但在做法上也具有同样效果的罪行,例如叛乱罪;

(f) 深入审查关于“危险状态”和有关安全措施的法律规定,以便消除可能损

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一切规定；

(g) 废除以政治理由差别对待公民(特别是在劳动和教育部门)的法律规定,并采取措施尽可能纠正过去在这方面所犯的弊端,例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人担任原来的职位；

(h) 废除禁止国内古巴公民未经行政当局批准不得自由进入和离开古巴的法律规定。这也暗示终止事实上对那些试图定居海外未成而遭遣返者的歧视待遇。侨居外国原籍古巴的人,特别是那些古巴国民应能享有同样权利,但必须遵守最低限度的行政规定；

(i) 根据有关国际文书的规定,尊重对正当程序的保障,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特别是采取必要措施使交由法院审判的所有人都能取得免费而有效的法律援助。这种援助应由完全独立执业的律师提供。

(j) 彻底调查环绕“3月13”号拖船沉没并造成许多人伤亡事件,以便惩罚肇事者并向受难者亲属提供赔偿；

(k) 确保监狱制度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和保障,以避免发生对犯人采用过度暴力及伤害犯人身心的事件。在这方面,如能延续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定,并允许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探访监狱,这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l) 准许在国际一级工作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更经常地进入古巴,以便评价人权情况,并提供其专长和合作,确保改进；

59. 国际社会应继续尽力支持在古巴建立和平的政治过渡进程来配合进行中的经济改革。还应确保向古巴人民提供其所需的适当人道主义援助,特别向儿童、青年、老人、妇女和残疾者这类易受伤害群体提供援助。还必须促进同古巴的多边和双边技术及金融合作,让该国政府和人民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协商一致地进行当前情况急需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人权方面。

60. 根据人权委员会在其第1995/66号决议中的邀请,该国政府应考虑制订一项关于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的可能性。该方案目标在于协助散播关于古巴人在人

权方面的资料和教育；协助国际专家进行技术研究，使国内立法更为符合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的人权规定；为宣传和保障人权设立国家机构。

注

- ¹ 见下文，和E/CN.4/1995/52，第40段。
 - ² 见《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报告》(E/CN.4/1995/52，第9段)。
 - ³ 同上，第10(1)段。
 - ⁴ 同上，第11(b)段。
 - ⁵ El Nuevo Herald, 1995年4月27日。
 - ⁶ “礼拜堂”于1990年获得批准，一般设于牧师的家里。
 - ⁷ 参看E/CN.4/1995/52，第30(b)段。
 - ⁸ 参看本报告第28段。
 - ⁹ 见E/CN.4/1995/52，第18段。
 - ¹⁰ 1995年第八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第三份报告(第4A部分)，《实施公约和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报告》，1995年日内瓦，第301至第302页。
 - ¹¹ 见上文第16(f)段。
 - ¹² 见E/CN.4/1995/61，第114段。
 - ¹³ 见E/CN.4/1995/52，第36至第43段。
 - ¹⁴ 同上，第41至第42段。
 - ¹⁵ 同上，第48-55段。
 - ¹⁶ 见上文，第18(g)段。
-